章与贺的四手联弹

数码相机的发明无疑是我们生活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不仅提供了随时随地拍摄的便利，而且不必担心“浪费胶卷”，想拍就拍，存储和传输也都方便。三年前又办起了博客，学会了压缩图片，一些在不同地方拍摄的图片可以及时上传出来，于是就颇有些发表的成就感。

柏林爱乐乐团



这是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我没有机会进入其中，不过，自己最喜欢的唱片和 DVD 许多都是在这座音乐的圣殿里演出的。例如，卡拉扬、阿巴多指挥的贝多芬九大交响曲等。1988 年，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卡拉扬与满身童稚气的苏联钢琴天才基辛一起演出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出大获成功，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怯生生的基辛走向卡拉扬，老人把孩子拥在怀里，

跟孩子的母亲说：这是个天才！第二年，卡拉扬逝世。临终前，他跟夫人说：我听到上帝在呼唤我。

波恩的贝多芬故居



这是我访问波恩的最大收获。

疑问建筑



在 2000 年我访问柏林的时候，在东柏林游览。看到了不少景致，其中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塑像，还有一些方方的缺乏个性的庞大建筑。另外，不同功用建筑的布局也很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某种趋同性。当时看到了一座称为"论坛饭店"（Forum Hotel）的建筑，但是，2008 年 4 月我再次访问这里时，发现当时的不少建筑都面目全非了，也没有找到论坛饭店，却看到这样的一座建筑，体型有些像，但是外观却不一样了，名字是 Park Inn，是否是那座老建筑，竟有些不确定了。

附：

建筑的政治学

贺卫方

一般人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大抵上是以上卷为主的，因为那里包含着作者最经典的民主学说。不过，下卷里却也有一些有趣的讨论，涉及民主制度与文化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例如，第十二章的题目也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建造一些那么平凡的建筑物又建造一些那么宏伟的建筑物。他主要的解释是，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每个个人都显得很渺小和软弱，但是代表众人的国家却非常强大。于是，他们在营造自家的建筑时不会过于讲求，但是，公共建筑却一定要气象宏大才符合国民对于国家的想象。虽然号称一章的关于建筑的讨论不过区区两个印刷页码，其中的思想还是很让人深思。

最近两本这个主题下的专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了，一是萨迪奇和琼斯的《建筑与民主》（Deyan Sudjic and Helen Jones, *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李白云、任永杰译，上海人民，2006 年 7 月版），另一本是萨迪奇的《权力与建筑》（*The Edifice Complex*，直译为《宏大建筑情结》，王晓刚、张秀芳译，重庆出版社，2007 年 5 月版）。两本书的同一作者萨迪奇出身爱丁堡大学建筑系，现在是著名的建筑评论家。前一本研究的范围主要是议会建筑，从古希腊政治集会一直到最晚近的苏格兰新议会大厦。后一本则侧重分析政治家的以建筑显示权力的情结以及建筑师如何周旋于那些权力与艺术之间，让读者了解建筑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初读《建筑与权力》一书，对于那么多的政治家热衷于建筑，热衷于通过建筑显示权力颇有些惊讶，凯末尔、希特勒、墨索里尼、巴列维、密特朗、萨达姆. 侯赛因、布莱尔……不一而足。关于希特勒，自己过去访问德国时，曾经在慕尼黑看到过一些线条质朴、与古典建筑风格迥异的白色建筑，陪同告诉我那正是纳粹时代留下的遗产。《建筑与权力》一书里对于希特勒这位建筑学院的落榜生如何终生痴迷于建筑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在希特勒看来：

> 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德意志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一个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有权力拥有这样的建筑，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都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书中有描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到德国总理府觐见希特勒的那一段，写得真是惊心动魄，既有对于哈查心理的描写，又有对于总理府建筑细节的刻画——总理府前广场四分之一英里的长道，没有任何家具陈设的大厅，透露出无比威严的强硬线条，闪闪发光的青铜门，四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所有这一切，把书中的一句话的意蕴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如果说建筑曾被用做战争的武器，那这里便是了。"

虽然萨迪奇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他 1992 年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他并没有对于中国古今的建筑与权力关系作出论述。记得基辛格在回忆录里提到过人民大会堂，他的评价仿佛是“庞大而丑陋”，那是否因为他第一次来华访问也在这里感受到某种羞辱？假如有适合的作者写一下社会主义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或许也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前次访问柏林，柏林墙刚拆除不久，东柏林作为东德首都的格局还没有变化，那里的中心广场的格局也是一边是大会堂，另一边相对的是博物馆，上首是领导人的检阅台，跟我们这里的格局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前面我们提到托克维尔，他主要讨论的是民主制度下的建筑风格，但是如果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专制与专制两种对立体制下的的建筑风格却有着类似之处，那就是国家政治建筑的宏大和一般民众住宅的渺小一样形成巨大反差。如果说民主体制下这个结果来自民众对于国家伟大的想象的话，那么专制体制下则来自于统治者把建筑作为震慑子民及外人的权力修辞术。此外，如果专制不仅建立在政治的集权上，而且也建立在财富的高度集中上，那么就会对小民百姓的居室风格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此话怎讲？无论怎样的房子，都要建在土地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土地的权利安排对于人们的建房心理和结果影响至大。如果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人们就会存长远之心，倾尽全力修造坚实华丽、垂之久远的屋宇。相反，如果土地权利设定短暂，朝不虑夕，甚至压根儿没有私人的土地所有权，那么私人就不可能用心费力建设美轮美奂的豪宅，反而只是追求眼前的享乐。孟子那句话我们都耳熟能详：“无恒产者无恒心”，与其他生活必需品相比，如果土地权利能够变成真正的恒产，建于其上的房子就会“恒产化”，它不止惠及一代，而且庇荫子孙后代。但是，如果人们没有长远之想，住宅能够遮风避雨就得过且过了。这是建筑的政治学的另一层意义。

原载《南方周末》2008 年 5 月 15 日



纳粹德国海军部，一座典型的希特勒喜好类型的建筑

大阪城

在居住的宾馆里俯瞰大阪城



大阪城，一座俊秀飘逸的建筑

在居住的宾馆里俯瞰大阪城



这是一张自拍的照片。夜晚，窗外的大阪城居然与室内的场景在玻璃上聚为一体了。

洪堡大学四帧



这样的书摊最让人喜欢，2000 年我在这里买到了一本关于柏林墙的英文书。



这是洪堡大学对面的一个小广场，纳粹时期曾在这里焚书。


WILHELM
VON
HUMBOLD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联邦德国议会大楼。从前是一座有些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二战时代顶部被炸毁。现在的顶部是一座透明玻璃与钢结合的独特结构，设计者为诺曼福斯特爵士。那个顶部也是个旅游景点，人们可以沿着内壁的长廊行走，向外是柏林市的景观，向下则是国会的议事堂。如果正赶上国会会期，完全可以边看景，边旁听国会辩论。



日本国会众议院议事堂。议长坐席之上有红色帷幕的是天皇宝座所在，不过，据说天皇基本上不来旁听。

附：

日本宪政何以能成功
贺卫方

2007 年 8 月 28 日下午，按照日程安排访问日本国会，众议院国际部涉外课的林山泰彦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2004 年 12 月，我曾经来这里访问过，不过，前次和这一次都只有两个小时，走马观花而已。上一次访问后，自己也有意识地搜集一些涉及到日本宪法以及国会制度的书来看，以弥补知识上的不足。以往访问欧美国家的议会时，由于自己国家缺乏议会政治的实践，导致相互交流只能在一个浅层次进行，这样的感受一直是自己很无奈的事情。当与外国的法官就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进行交流时，总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充满了交流的愉悦，与在国会里的交流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日本的国会成立于 1890 年，一开始就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贵族院仿效英国贵族院建立，成员几乎完全由世袭或敕选产生，贵族是在 1884 年敕封爵位的前宫廷贵族、封建藩主以及政治精英。众议员由缴纳 15 日元以上税款的男性国民（仅占全国人口 1％多）选举产生。按照 1889

年宪法，预算和任何永久性的法律都必须经过两院的多数通过。虽然这样的国会距离当年民主派的理想相距甚远，不过，“日本国会虽有局限，却是非西方国家第一个试验成功的国会制度。尽管开始时摇摆不定，但这个制度生存了下来，并被证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得到出色的发展。”（赖肖尔：《当代日本人》，页 83-84）

现代议会离不开政党政治。日本国会之所以能够“得到出色的发展”，是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政党制度有关的。在国会主建筑的大厅里，矗立着为国会发展贡献至伟的三位政治家的塑像，他们是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这三位中的板垣和大隈是宪政初期两党的领导人，伊藤则是明治宪法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推行者，也是 1900 年从板垣那里分裂出来的新政党政友会的领导人。部分地依赖日本没有全面接受那种彻底改造社会的激进的外来学说，政党政治也没有走上两党之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结局。所以，直到今天，虽然有过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其实是内部多种派系竞争执政）的历史，但是，不久前的选举中，民主党已经成为参议院（从前的贵族院）中的多数党。这样，一些法案，例如《反恐特别措施法》，在众参两院均能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事实上，这也成为安倍晋三首相于 9 月 12 日宣布辞职的直接原因之一。

所谓现代的政党政治，祛除意识形态上的神圣色彩，把党见差异限制在国计民生的世俗事务上是相当重要的，否则就难免把党争演为战争。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政党也多少应当避免过于结党营私，要体现出某种政治美德、处事的真诚以及对于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忠诚。在这个方面，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政治丑闻，不过，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官僚体系大致上保持了相当的忠诚、富于牺牲的精神和工作效率。这种忠诚和对效率的讲求确保当政党利益发生冲突时具有相互妥协和继续合作的空间。这也是日本国会能够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

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引进的议会制度之所以流于失败，还因为人们无法通过议会以及宪法来对于君主（如果还保留的话）或无君主之名但有君主之实的威权者的权力加以限制，议会主权终不免变成一种装饰。国民只是付出了支撑议会运行的代价，却全然享受不到民主制的好处，实际上仍然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这种虚假的民主制甚至比从前那种君主制更糟，因为君主制还假定了国王或皇帝对于社稷的责任，而在虚假民主制之下，真正的决策者却根本不会为决策所带来的任何后果负责。在这一点上，日本又是东方国家中的一个特例。既保留天皇，却又实行真正的议会主权，这样的君主立宪体制能够历经“激荡的百年史”而保存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前近代社会结构和历史演进差异带来的影响。遥想当年，将军藩主拥兵自重，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但是奇怪的是，没有哪个赳赳武夫想到“天皇轮流做”，用暴力取而代之，黄袍加身（关于日本人对于天皇的观念及其对于日本政治生活的影响，参看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版，页 87 及以下；赖肖尔，前引，238-43）。超越孝道而把对国家的忠诚置于首位，这是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一个重大差异，也解释了后来两国政治制度近代不同走势的根源。

回到跟林山泰彦先生的交流。他告诉我，虽然众议员的任期是四年，但是由于首相可以在形势对于本党有利的时候解散议会，举行众议院选举，因此，大致上只能平均到三年。政府解散众议院举行再选举目的是为了直接诉诸国民意志本身。当然，重选的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那就是反对党占据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那就意味着政府的更迭。与众议院不同，参议院是不能解散的，这有助于确保议会决策的审慎，不至于总是受到一时的民意的约束。所以，人们称众议院为“言论之府”，而称参议院为“良心之府”。参议员任期六年，但每三年改选其中的一半。在财政方面，权力更多的在众议院。财政预算必须先交众议院审议，即便参议院不同意，也不影响在 30 天之后自动成为国会的最终决定。涉及到其他事务的立法，如果参议院否决，则众议院必须由三分之二多数再通过才能定案。惟一的例外是宪法修正案，必须取得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通过。当然，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修正案出现。

面对我这个外国人，作为立法机构官员的林山先生也直言不讳地谈到安倍首相正遭遇执政的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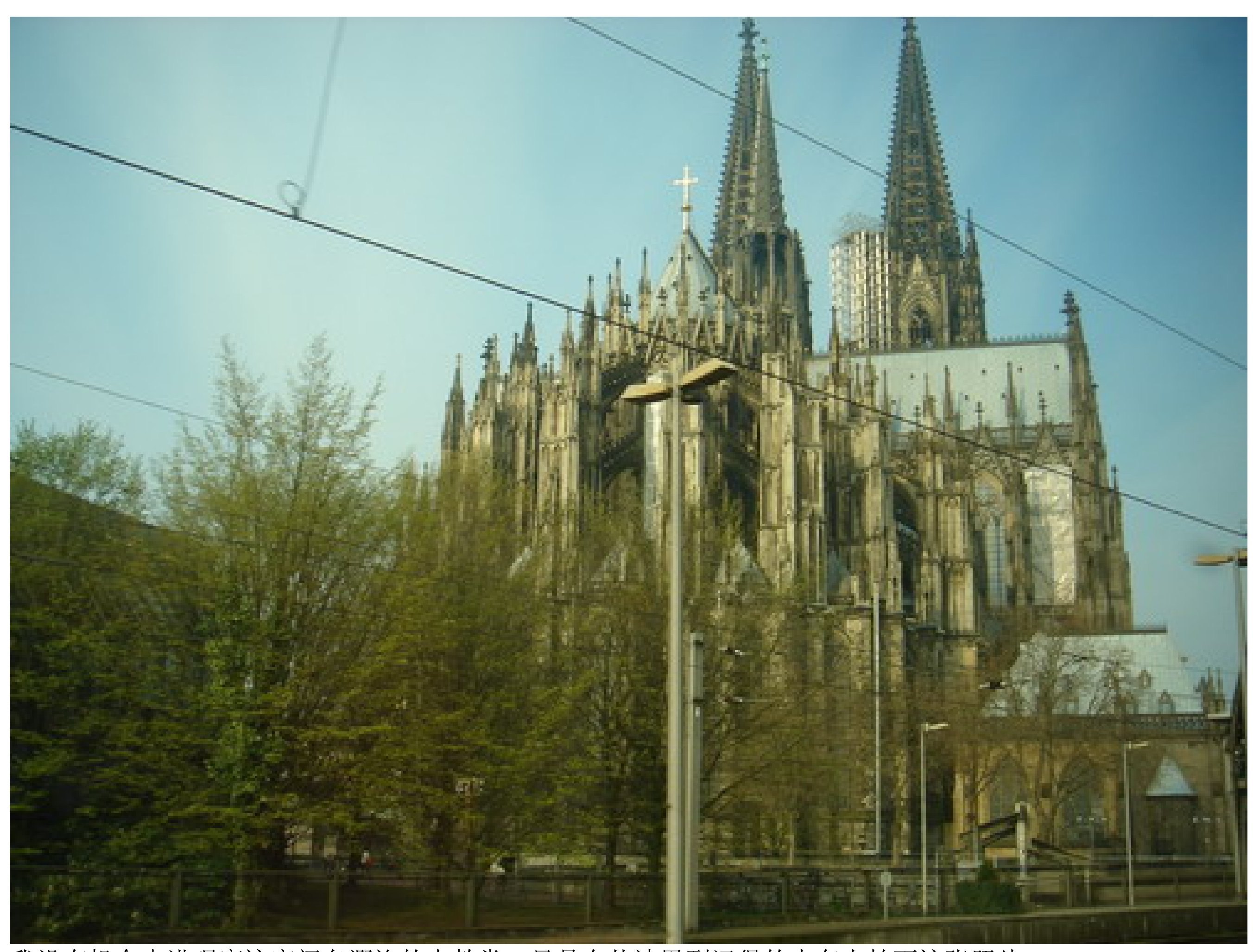
难时刻。不解散议会，也可以进行自民党总裁的重新选举，但是，假如重选，安倍获胜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安倍上台以来所提出的“美丽的日本”以及“修改宪法”之类的政策目标，日本的百姓没有多大兴趣。相反，小泉内阁留下的一些后遗症，诸如贫富差距的拉大，医疗费、税收的加重，以及养老金制度方面的问题，却是国民最关注的，但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另外，民主党咄咄逼人，该党总裁小泽非常努力地到农村拉选票，获取更多人的支持。一些传统上支持自民党的利益集团也出现了背离的趋向。看起来，日本持续很长时期的自民党强势地位的政党格局正在面临历史性的转折。正像民主党所追求的那样，出现一种美国式的力量相对平衡的两大政党也未可知呢。

交谈中我提起国会议员的背景情况，林山先生称由于均由选举产生，似乎在两院之间没有多大区别。我说好像日本政坛上许多人都属于世代相传，彷佛世袭制似的。得到的答案是，两年前选举后，众议院议员中这样的世家出身者约占四分之一。回来后我查阅了 2004 年访问国会时木村仁参议员赠送的《国会议员要览》（平成 16 年即 2004 年 10 月版），发现当年的国会议员中，三等亲内有前任或现任国会议员的，众议员中有 154 人（该院议员总数 480 人）；参议员中有 38 人（总数 242 人）。众议员出身政治家族的比例要高于参议员，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外。《要览》还详细列举了议员们出身不同大学的比例和人名，东京大学出身者比例之高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众议员中有 104 人，参议员中有 43 人。与东大同样杰出的京都大学却少了许多，众议员里只有 23 人，参议员则是 15 人。东京大学作为政客的摇篮，的确并非浪得虚名。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政治的某些特色。



上文谈到日本国会主厅矗立着为国会发展贡献至伟的三位政治家的塑像，他们是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但是大厅有四个角，另一个没有塑像，却留下了一座塑像的基座。陪同我的人告诉说，这是一种对后来政治家的激励，让他们努力奋斗，争取成为站在这个基座上的人。我说，在政治已经进入非英雄主义时代的今天，要出现这样的政治家恐怕是很难了。

科隆大教堂的身姿



我没有机会走进观察这座闻名遐迩的大教堂，只是在从波恩到汉堡的火车上拍下这张照片。



波恩市一座教堂墙上的浮雕


海德堡的歌德像

海德堡老桥。对岸是著名的哲学家小道。



日本。上智大学附近的一座名为 St Ignatius 的教堂



还是上智大学旁的那座教堂



澳门科技大学，毗邻那座著名的赌城



中台禅寺（在台中的一座现代化寺庙）


中台禅寺里的塑像

吴哥窟印象

能够到柬埔寨开会，实在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会议的地点安排在著名古迹吴哥窟所在的暹粒市，地处金边西北方向。飞机自香港起飞，两个多小时后到达金边，转机后大约半个小时即到达暹粒市（Siem Reap）。据说这个城市名的意思是泰国人遭到毁灭的地方，透露出历史上这个区域的战争信息。

会议之外，游览吴哥窟是重要的项目。尽管久闻大名，但是吴哥窟的规模浩大和雄伟壮观还是远远超出了预先的想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自十五世纪起，也许因为战争的缘故，这个建筑群就完全败落。直到十九世纪，西方人来到这里，将信息传到各地，这座宫殿才在世界范围内大放异彩。十五年前，这个国家结束了战争，暹粒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成为一座酒店林立的城市。我们住在一个名为 Grand Hotel d'Ankor 的酒店里，服务细致周到。当然，走出酒店不远，就知道这还是一个百姓相当贫穷的国家。

吴哥窟是一个值得用一个星期慢慢看的古迹。这里选了几张用傻瓜相机拍的照片，只不过沧海一粟而已。



黑与白（柬埔寨吴哥窟里的塑像）


吴哥窟。一座建筑可以被植物如此欺凌，远不止是“草盛豆苗稀”可比了。


吴哥窟。一组浮雕展现的是古代的中国军人南伐的场景，其中一位的面相有些似曾相识。



在那片辉煌的废墟中，
一个角落里悄然无声，
你端庄地站里着，
千年里无尽的斜雨秋风。

可是，你当真是刻在这坚硬的石头上？
你的嘴角为何那样生动？
丰富的情感洋溢在这下午的阳光里，
这是现实还是一场梦？

2007-1-21 吴哥窟



汉堡建筑上的亨德尔



汉堡一景

梦幻般的哥本哈根之游

贺卫方

当地时间四月十一日下午，我来到汉堡机场，搭乘北欧航空公司晚上七点起飞的航班前往哥本哈根。按照日程，在哥本哈根机场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转乘同一公司飞北京的航班回国。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天气的原因，汉堡到哥本哈根的飞机延误了两个半小时，赶到哥本哈根时，到北京的航班已经飞行一个多小时了。匆匆来到北欧航空转机服务柜台——

“天哪，你到北京！这可怎么办？”接待的人诚恳而面带微笑。

“是啊，我必须尽快赶回去呢。”我的语气一片焦虑。

“这样吧，今晚你只能住在我们在哥本哈根的宾馆了。如果你要选择最快到北京的航班，可以乘明天上午八点半在这里起飞到法兰克福的航班，然后在那里转直飞北京的航班，这样你在北京时间 13 日上午八点半可以到达北京。”

八点半起飞，太早了。而且还要再转机，我担心如果到法兰克福的航班再衔接不上，那可就麻烦了。我何不再乘坐明天晚上从这里直飞的同一航班回京呢，这样也就比到法兰克福转机的航班晚四个小时，但是，却有一整天的时间在哥本哈根。

“我还是乘明晚你们直飞北京的航班吧，不要再到法兰克福了。”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让我查一下明天还有没有空余的座位……哦，你很幸运，还有两个座位，贺先生（Mr. he，英文第三人称单数）。我给你出登机牌了。这里是你到宾馆的往返出租车票，你到外边车站搭一个出租车就可以了。晚安，Mr. he！”

出了机场，搭乘一辆出租车，离开了机场。司机是一个看上去来自中东一带的中年人，收音机播放着听不懂的语言和歌曲。一会儿，感觉车走的道路两侧越来越偏僻，路边没有建筑，也没有多少灯火，不免有点担心，是不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还好，一会儿看到了远处的饰有 SAS（北欧航空的标志）的大楼。到了宾馆，总台热情接待。单人房间。“这是晚餐卷，这是明天早晨的早餐卷。祝你在本店愉快！”

吃过夜宵，回到房间，洗洗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拉开窗帘，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景色：



可以想见我是多么喜出望外，庆幸自己没有选择一早就离开的航班，否则哪里会有一整天盘桓在这座世界名城的意外收获。



哥本哈根街景


哥本哈根街景



胡适故里上庄村


胡适墓前的塑像

向胡适校长鞠躬

贺卫方

2007 年 3 月 12 日，终于有机会到位于南港的胡适先生墓前，向这位二十世纪中国的伟人、北京大学的先校长表达自己的敬意。为了这一刻，自己已经盼望了好多年了。

就像四十五年前他去世那天一样，南港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承中研院法学所的一位朋友陪同，

来到了那座旧庄山坡上。拾级而上，哲人的墓地终于出现在眼前。自己禁不住心中的激动，认真地三鞠躬。伫立在墓前，胡颂平《年谱长编》里描述的安葬时的情景仿佛在眼前浮现。

墓志铭是毛子水先生的手笔，可谓逝者倡导的白话文的至高境界，文字平易而又含义深长，朴素而又庄严：

>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 生于中华民国纪前二十一年
>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异，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
>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
>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胡适先生的墓碑是跟盖石一体的。上面是于右任先生题写的碑文："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墓的左前方草地上前后有长子胡祖望的墓和次子胡思杜的纪念碑。江冬秀故于 1975 年，胡祖望故于 2005 年，胡思杜只是纪念碑——留在大陆，自缢于 1957 年的胡思杜尸首被草草掩埋，早已无从找寻了。

毛子水的墓志铭特别表彰胡适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所作的努力。实际上，胡适生前讲的最后的话正是关于言论自由的。面对参加院士会议的学人，胡适特别说：

> 海外回国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个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批评政府，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

说到这里，忽然胡适停住了，"也许感到不适了，急忙接着说："（据胡颂平）

>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他还站在讲话的地方，正想转身跟谁说话，却仰身向后倒了下去，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

显然，说到言论自由这个话题，胡适心情变得非常激动。他在收住讲话之前，好像还有一些话要讲。已经说出的是对于台湾言论自由进步的表彰，但是，后面是否有"但书"？我们知道，刚刚一年多前，雷震因为批评政府而身陷囹圄，此刻正在监狱服刑。1960 年代初期的蒋氏政权对于言论自由的敌意和压制可谓劣迹斑斑，作为曾为雷震案而当面向蒋介石表达异议的胡适，对于这种情况当然是心知肚明。但是，此刻他却在表扬政府，也许下面的听者们也会觉得他的话实在是言不由衷，胡适是否在说反话，或者欲擒故纵，先泛泛地肯定，接着要对于政府的劣

迹大加鞭挞呢？随着胡适的倒下，这已经成为永远无解的谜了。

胡适墓园后来名为“胡适公园”，墓地右侧，有语言学家董作宾的墓，左侧是胡适的塑像。想起近年来不少议论，希望北京大学能够立一座胡适像，但是，校方却完全没有回应。其实，比立塑像更大的事情是，我们怎样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延续胡适的事业，实现他的自由梦想。在离开墓地时，自己心中默念起胡适为狱中雷震祝寿抄录的杨万里诗句：

> 万山不许一溪奔，
> 拦得溪声日夜喧。
> 到得前头山脚尽，
> 堂堂溪水出前村。



台湾发行的胡适诞生百年纪念邮票



胡适纪念馆（南港旧居正门）

在胡适纪念馆
贺卫方

来之前，我想象中央研究院可能只是一栋大楼而已，没想到这里却是更像是一所大学，很大的院子里，矗立着许多不同风格的楼房。据说自从李远哲先生担任院长以后，经费大为增加，年度预算达到了百亿新台币之巨（新台币与人民币之比大约为 4：1），所以，新建筑不断增加。例如，法律学研究所（筹）就在落成不久的人文社会科学大楼里。大楼一楼和地下层里的图书馆设计极其宽阔舒适，落地窗外，山色青青，图书全部开架，查找相当便利。

与这些后起的高楼大厦相比，胡适纪念馆显得矮小，不起眼。3 月 12 日拜谒胡适墓时，知道胡适纪念馆开放时间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六两天，之后 14 日又专程跑一趟。进门后打听两次，才找到了目的地。

一位老太太刚从馆中出来，接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参观。馆中工作人员庄小姐和义工余先生热情地接待我，当知道我来自北京大学后，更是问长问短。也许他们对于一个大陆的法律学者对于胡适会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有点意外。庄小姐还问我：大陆的人们好像应该更喜欢鲁迅的吧？我

说，因为过去官方人为地神话鲁迅，现在读鲁迅书的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反而是曾经被妖魔化的胡适，今天在人们心目中更高大起来。

纪念馆分展厅和故居两个部分。展厅里分三个主题对主人公作图文和实物的介绍，三个主题是胡适的情感世界、胡适的学术文化成就以及胡适与近代中国。陈列的遗物包括各种生活用品，获颁的各种奖章证书等，还有一些书信、手稿、在书页上的批注等，令人睹物思人，感念伟人风范。除了常规展览外，还有不定期变换的特展，这一次的主题是胡适与言论自由，陈列了胡适在这个主题下的一些作品，尤其是跟《自由中国》事件相关的一些文献，例如胡适与雷震之间的往还书信等。

庄小姐问起我胡适文物在大陆的情况，我只是知道 1948 年胡适留下的百余箱图书、书信以及其他文件已经被分散到社科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以及国家图书馆等几个机构，记得《中华读书报》曾有专文报道，似乎各个机构都不愿意相让。其实，能否相聚是一回事，重要的一是需要妥善保存，二是能够把一些适合陈列者向公众开放。例如，如果北京大学图书馆能够辟专室本馆所藏胡适藏书及遗物，常年开放，那不只是对于老校长的最好纪念，而且也有助于师生们了解本校历史，追随先贤精神。这是典型的惠而不费的好事情，很期盼保管着这些遗物的机构能够玉成一下。

实际上，胡适在南港只住了不足四年（自 1958 年 10 月回国到 1962 年 2 月去世），故居是平房，原是中研院的会议室，后改造为住宅。今天的一切仍然按照胡适生前的样式布置，简朴而富于书香气。有一间是江冬秀的卧室，不过她倒没有怎么在这里住，因为南港离城太远，她是好热闹的人，耐不住这里的寂寞，似乎大多住在台北。当时的交通，来往之费时，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也看得到胡适的抱怨。

参观中，我忽然想起胡适遗嘱的事情。以前只在胡颂平的《年谱长编》里看到过中译文，但英文原文却无从得见。就问庄小姐，她告诉我需要通过电话向主事者询问。次日，我打电话询问，对方告诉说可以给我提供原文复印件，怕他们费邮资，我就请他们寄到东吴法学院的朋友那里再转寄我。意外的是，我回到北京，接到一位女士电话，说要直接寄到北京。这种负责精神让我很感动。

在纪念馆，买到了两套该馆印制的明信片，一套是胡适照片，一套是胡适手迹。另外，还意外地买到了 1966 年出版的《胡适手稿》第一集，线装本一函三册，索价才 400 新台币（人民币一百元！）。可惜只有第一集，其他九集都已售罄。不过，考虑到已经买了那么多的书，再增加九函二十七册，行李必定超重，心里也就平衡了。

I, HU SHIH, residing in the Borough of Manhattan, City, County and State of New York, hereby make, publish and declare this to be my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revoking any and all other previous testamentary dispositions made anywhere at any time.

ARTICLE FIRST: I direct that all my just debts and funeral expenses be paid, and in this connection I request but do not direct that my body be cremated and my ashes so disposed of as my Executors deem appropriate.

ARTICLE SECOND: Confident that academic freedom will one day be restored to Peking University in Peiping, China, I give and bequeath to that University all my books and papers contained in one hundred and two boxes which were left a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for safekeeping when I was obliged to depart from Peiping in December, 1948.

ARTICLE THIRD: To the Academia Sinica, now at Nankang in Taipei, Taiwan, I give my portrait painted by Mr. Albert D. Smith.

ARTICLE FOURTH: I give and bequeath all my manuscripts and papers and also all the printed books in my residence in New York City, to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t Taipei, Taiwan, and request but do not direct that PROFESSORS YANG LIEN-SHENG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MAO TZU-SHUI of Taiwan University or the survivor of them, make such arrangements for safekeeping, editing and publishing of my manuscripts and papers as to them

胡适英文遗嘱第一页。



胡颂平的日记

贺卫方

今天到学校办点事情。午饭后途经图书馆，忽然想起特藏部主任张红扬主任曾电话告诉我，胡颂平先生的家人已经将胡先生的日记全部赠送北大图书馆，张主任希望我有兴趣不妨来馆一看。何不趁此机会去看看呢。于是就来到特藏部，真巧，张主任正好在办公室。她没有介意我这种未约即来的冒昧，跟对于胡适文件很有研究的周老师一起陪同我观看了胡颂平日记以及胡适藏书。

虽然看《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时已经知道颂平先生所用的是一种便携式的日记本，但是当周老师把九十馀册日记中的六册放到案子上时，自己还是有些惊讶，那真是一种相当小开本的册子（回来找了相当开本的书，发现应当是 787X1092 的 64 开本），像是六十年代流行的语录的样式，塑料封面。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工整而秀气。自 1958 年 12 月给胡适做秘书开始，颂平先生就恢复了中断二十年的记日记的习惯，随日记录胡适的言行。这一册册日记成为我们了解晚年胡适的重要素材，凝聚了作者的勤勉劳作，令人肃然起敬。日记里还夹存着一些纸条、照片等，纸片上也有对于某些事项的记录，或许是当日记本不在身边时，为了备忘专门记下的。自己很希望北大图书馆能够在征得颂平先生家人同意的前提下，将这些日记准确整理出来，公开

出版。

看过日记后，张主任、周老师又陪同我到书库参观了胡适的藏书，这正是胡适 1948 年离开北平时留下的 102 箱书籍文件的一部分。据周老师介绍，大致上珍稀书籍都被国家图书馆收留了，手稿文件等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其他中外文书籍都在这里了。看着书架上的这些中外文书籍，涉及领域极为广泛，体现了胡适宽广的知识视野。很珍贵的是，其中不少书系原作者题赠本。我意外地发现了美国已故大法官弗兰克福特（1882－1965）的一本著作，翻开封面，就看到了作者的题赠字样。

从作者 1948 年打包封存，这些书与一般读者已经暌违近一个甲子了。多么希望北大图书馆能够早日设立专门的胡适纪念室，将它们陈列上架，向本校师生以及一般读者开放。这是北大当局对于故校长更是对于今天的师生以及公众的一项重大责任啊。（在 3 月 22 日博唠阁里的一篇文字里我已经提出过这个建议，据张主任说她已经印出呈送馆长了。）

附上一篇在网上检索到的关于胡颂平生平的介绍文字，题为“胡颂平：为晚年胡适立言”，作者是陈绍鲁、张志杰（或许是发表在胡颂平家乡的《温州日报》上吧）：

胡颂平：为晚年胡适立言
陈绍鲁 张志杰

日前，《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被著名网上书店“卓越网”评为2006年度100种好书之一，成为了解胡适晚年思想的重要材料与胡适研究的必读书。据悉，该书去年底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其编著者胡颂平为我市乐清人，与胡适相识三十多载，更是他晚年的秘书与助手。由此，该书无疑也成为近年温籍作品里的重磅力作。

胡颂平生平

胡颂平 1904 年出生于我市乐清虹桥镇杏庄（现黎明村）。少时聪慧，精读经史，过目不忘。某日，与校友陈侠超同访业师林某，师之侄不喜读书，师命其两人撰联劝之，他才思敏捷，立就吟成二联：“朱颜绿鬓宁常驻；黄卷青灯宜及时。立志应期名有寿；读书岂仅俗能医。”业师闻后频频点首。

1922 年，他考入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曾师从朱自清、马孟容等名师。1926 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1928 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继续读书。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追随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到杭州任职，此后一直在国民政府任职。1934 年，胡颂平与宁波镇海女子薛妫珍在上海结为秦晋。此后 54 年，两人风雨同舟，恩爱如初。夫人薛妫珍温婉端庄，善良贤惠，主持家务，井然有序，无论寒暑，井臼亲操，还烧得一手好菜。胡颂平收入不丰，一家全靠她精打细算，克勤克俭过好日子。晚年胡颂平缠绵病床，她设法系一长绳于身上，一旦需要，胡颂平抽紧绳索，她便放下家务，赶来伺候。

1988 年 8 月 14 日，胡颂平因心脏衰竭而长眠。其追悼会由中央研究院主持，原台湾立法院院长倪文亚先生（乐清虹桥人）题写挽幛。研究院的悼词对亡者的人品和道德风范作了如下赞评：先生智慧如海，天性纯诚；处世以庄，待人以诚；任事惟勤，治学严谨；温文尔雅，谦光挹人，固彬彬君子也。

胡颂平与胡适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在给胡适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的同时，也揭示了编著者胡颂平与胡适非比寻常的密切关系。而说起两人的相识，还得从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时说起。

当时胡颂平就读该校的政治经济系，选过胡适在暑期班开的"中国最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又旁听过胡适在大礼堂上主讲的"文化史"，除了听胡适讲课外，他还曾到胡适家里去请教、谈话。1946 年 7 月，胡适由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每次到南京教育部办事，胡颂平总是抽空拜谒，并代为办理一些琐事，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58 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胡颂平更是做了胡适的秘书和助手，直到胡适逝世为止，历时近四年。

在胡适的最后四年里，胡颂平每晚下班回家，想想白天胡适先生的言谈，极感兴趣，他想，若不设法保存，将会随同时光流失，岂不可惜。有了这么一个意念，踌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忽然想起民国十九年马相伯先生九十岁生日时，胡适先生曾对新闻记者的访问说："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他从这段话里豁然有悟，于是下了决心，就在 1958 年 12 月开始，记录下胡适的言行。

这样秘密记录大约一年后，事情被胡适发现。一开始胡适很紧张，不知胡颂平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在得知原委后，胡适很豁达地说："你还是当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胡颂平用的是袖珍日记本，经常放在衣袋里，白天难得有空，总要到夜里回家默记的。一年下来，渐渐地记了六七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就是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完成的。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作为如今胡适研究的必读参考书，《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主要记述胡适晚年的言谈，起于 1958 年 12 月 5 日，止于 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适卒于"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大会的酒会上。内容诚如封底所言，"胡适之先生学识渊博，见闻广阔，他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

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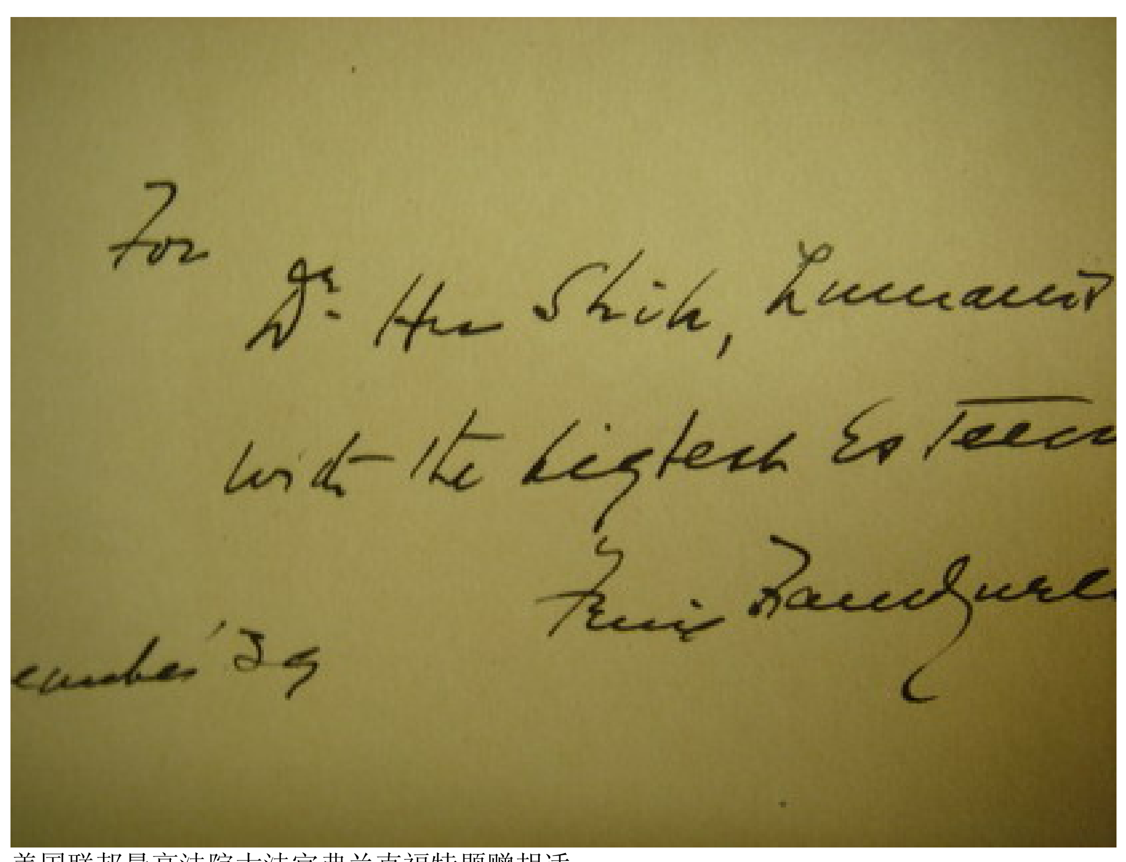
此书精彩的细节不胜枚举，喜欢近世典故的读者读起此书来会津津有味。胡适一生交际广泛，老来对各种人物不免有所品评，尤其是私下言谈，更少顾忌。比如他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认为翁文灏大少爷出身，又在比利时接受修士的训练，“养成一种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例如王国维与罗振玉的不同：“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此书也有较高的趣味性。胡适之先生提倡现代“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这本书里有他的现身说法，他是怎样阐发和实践怕老婆理论的，他还认为，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书中不少内容还涉及胡适对读书做学问的看法。如胡适之先生认为，“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件不道德的事。”为此，他有自己的戒律，“不潦草，不苟且，个个字清楚，排字工人不会排错的一个样子。”对于学术成就的取得，他认为，“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工夫的人。”“像顾亭林，少年时才气磅礴，中年时才做实学，做笨的工夫。你看他的成就！像王念孙、王引之、戴东原、钱大昕，都是绝顶聪明做笨的工作才能成功的。”

而温州的读者读此书更有亲切感，因为每读几页就会发现与温州有关的内容。如温州的古地名中有叫横阳的，温州在南宋时代很了不起的，胡颂平想邀胡适之游雁荡山，“鲞”字的读音，翻一个身睡乐清的土话叫“翻辨转脊”.。当然涉及较多的还是学术方面的，如提到黄群编印的《敬乡楼丛书》、南戏、孙诒让与《永嘉丛书》、陈介石、林损、南怀瑾等。这些内容，更大原因与编著者胡颂平是温州人有关。

著名学者贺卫方读了此书后，大发感叹：如果其他像胡适这样的“国之瑰宝”型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都能有人对其言谈作经常的和准确的记录，那么思想史和学术史将会增添多么丰富和生动的史料。他并认为此书可与《歌德谈话录》相媲美，如此看来，胡颂平先生的工作其意义不可低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弗兰克福特题赠胡适



台湾商务印书馆（或云五大楼）

台北访书记

贺卫方

我在八年前访问台湾时，因为日程安排紧张，没有逛太多书店，记得除了法律书外，只是买到了钱锺书先生两本书的台湾版而已。这次时间比较从容，总算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逛书店了。从到达那天起就盘算着什么时候出去好好淘书。

说到逛书店，首先要感谢张立汉君（网名 Alex，他是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一位在网络上很活跃的年轻朋友。春节后他曾经来京访问，可惜我那时“鹤”体欠安，无法跟他见面。这次到台湾，总算补上这个缺憾。更重要的是，按照立汉的说法，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要向我展现台北的“升斗小民的生活”，包括请我在士林夜市吃那些很诱人的台湾小吃，尤其是“蚵仔煎”、“鼎边剉”等等，实在是美不胜收。夜逛书店当然也是这升斗小民生活的最具魅力的部分。

那是 3 月 14 日，我晚上在东吴的课是七点到九点，立汉也来到我的课堂听课。我们提前已经商定课后逛书店、吃夜宵（为了很宰他一顿，上课前我特意没有吃晚饭）。下课再跟大家聊一会儿，已经是九点半了。立汉开车拉上我，他要先带我去看一下台北最著名的书店诚品书店旗舰店所在的那栋大楼去看一眼，然后再到二十四小时开业的诚品敦南店去买书。果然，夜色中的诚品雄伟的身姿令人印象深刻。在台北最繁华的商业区里，八层店面，书店面积三千坪，图书达到百万册以上，这样的书店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随后我们来到了敦南店。虽然比信义店小了许多，但是规模之大还是超过我的想象。已经是深夜了，但是店里的顾客还是摩肩接踵。许多人席地而坐，手捧一册，好像把这里当成了图书馆或者自家的书房。我来到历史类和政治类，看到不少有意思的题目。法国著名学者和评论家Guy Sorman的《鸡年中国行记》（L’Annee du Coq， Chinois et rebelles）中译本放在特别醒目的位置上，不过这本书我刚来第二天就在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的小书店里买到了，而且已经读过一遍。其中有对于我的采访内容，博唠阁的访客也许会记得我曾发表过题为“与索尔曼先生谈中国法治”的文章（http://blog.sina.com.cn/u/48866320010002fq，同时也发表于《法制日报》2005 年 10 月 23 日）。遗憾的是，这本书在大陆也许很难出版，跟有些书不一样，索尔曼的书完全无法出版一个删节本。闻过则喜，又谈何容易！

在文学类的架子上，我看到了书林出版社的钱锺书先生著作台湾版，就买了《槐聚诗存/石语》的合集本（1999 年）。另外，还意外地看到了《毛泽东语录》的台湾版，也是小红书，除了书名不叫“毛主席语录”，文字用繁体字，目录、内容等居然是照单全收，不易一字。放在当年威权时代，哪个出版社敢出版这样的书，那可真是活得腻味了。

另外，我还在嘉义市的“杭州书店”以及台北的“古今书廊”、“公馆旧书城”、“书香楼”等旧书店里淘得若干有趣的书，列目如下：

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年初版；
李文庆编：《新闻评议十二年——中华民国新闻评议委员会的组织与功能》，非卖品，1975 年；
海耶克著，殷海光译：《到奴役之路》，文星丛刊，文星书店 1965 年再版；
磐尔（Heinrich Boell）著，蔡伸章译：《爱尔兰之旅》，志文出版社 1973 年初版；
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编印：《匪酋重要讲话及社论评论专辑》（第五十号），1980 年 4 月（注“密”字（这本书编号 037，232 页的一本小书要价 150 新台币，店家解释说这类足以反映过去政治状况的秘密出版物现在已经成为收藏者搜罗的对象，因此价格就高了起来）；
周之鸣编：《费正清集团在台湾大阴谋》，国际共党问题研究社印行，1969 年初版，1978 年三版；
莫尔（Thomas More）著，刘成韶译：《乌托邦》（布面精装），译者自刊本，1957 年初版（译者题赠给“家骆先生”）；
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商务印书馆 1971 年台一版（此书系在重庆南路商务印书馆即云五大楼购得）；
钱锺书：《谈艺录》（布面精装），野狐出版社，不著日期，无版权说明，无定价，盗版无疑；
钱锺书：《围城》，中国现代文学丛书，文教出版社，亦属无日期、无版权说明、无定价之三无盗版品。当然，对于我而言，这类盗版却有着收藏上的格外价值。



在大阪市的一家名曰“梁山泊”的旧书店

在日本买书
贺卫方

对于一个不懂日文的中国人而言，最郁闷的事情也许就是在日本逛书店了。看着书架上的那些书名，大抵能够知道那是写什么的书；但是翻看内容，却也仅仅能够认出其中的那些汉字而已，似乎应了那句“热闹热闹眼睛”的老话。不过，每次访日，还是一定要到书店看一下，也总会有些收获。例如，过去就买到过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以及《围城》的日译本，丰富了我的钱著收藏。

这次访日，虽然是匆忙的旅行，但是，在大阪还是让陪同我的林和孝先生带我到旧书店去看一下。大阪的旧书店集中在修建于一条铁路桥下面的商业区里，名叫“阪急”。一些古旧书店的店名都很有趣，例如有一家叫做“古书肆梁山泊”（我读《水浒》，发现梁山好汉们似乎不怎么读书的），有一家名“中尾松泉堂”，市招用篆书题写，咱们就感到特别亲切。

这里的书店每一家都品种多样，也都有自家特色。虽然不懂日文，但是那些透着古典书香、装帧典雅精致的出版物也的确是令人爱不释手。在一家以经营初版书相号召的书店里，发现了书架上的一本书，《支那山水随缘》，作者桥本关雪，从封盒里取出书来，纸面精装，是作者在中

国游览的随笔集，其中有不少作者本人的插图，扉页之后便是一张画着梅兰芳天女散花的彩色插页。初版本，日期是昭和十五年六月，问林先生，得知是西历 1940 年，日本侵华战争最激烈的年头，作者在报章上连载他游离江南、北京、山东、河北等地的见闻，随后结集出版。文体似乎很闲散，加上那些中国画法的插图，不免令人感觉其间巨大的反差。晚上在旅馆上网，检索作者，才知道桥本关雪（1883－1945）乃是日本画坛的一代宗师，也是研究石涛以及中国艺术的专家。1928 年曾在上海举办画展，与中国的不少艺术家过从甚密。傅抱石就有“写关雪意”、“仿桥本关雪访隐图”等名作。

买到的其他书算不上是古旧书，包括陈舜臣的《六甲山房记》（岩波书店 1987 初版）、中村太郎的《西方见闻录》（星云社 1988 新装版）以及井上薰的《死刑的理由》（新潮社 1999 年）。陈舜臣先生是旅日著名作家，多年前我读过他的历史小说《大江不流》，把甲午前后以及战争的过程写得令人心惊和叹息。中村太郎 1919 年出生于济南，1975 年创立中国人研究所。这本书也是游记性质的，书名中的“西方”指的应该是中国的西部。

《死刑的理由》与中国无关，不过却是我很感兴趣的那种。作者搜集了自 1983 年到 1995 年日本最高法院最终确定的死刑案件共 43 件，对于犯罪情节、不同审级法院的量刑理由等加以细致阐述，并对死刑问题作出反思。我想可以设法购买翻译版权，约请一位研究刑罚并通日文的学者把它翻译出来，也许对于我们如何对待死刑有些参考价值。



日本画家关雪笔下的梅兰芳



饮冰室


大總統頭等政治顧問官
莫理循


莫理逊图书馆的图书最终被日本人收购，是一种永久的痛。

基钦纳勋爵访问中国

贺卫方

近读珀尔（Cyril Pearl）的作品《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其中不少清末民初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五大臣考察西洋，遭到英王爱德华冷遇，致使大臣们对于英国君主政体不愿意说好话。那五个大臣中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是“鸦片鬼”，一位已经 82 岁，

另一位 79 岁，所有成员对于外语都一窍不通，而且即便通也没有多少用处，因为其中耳聋者不少。这样的考察团能够对于外情有怎样的观察确实大可怀疑。

作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记录了不少当年西方要人访问中国的情形。1909 年 10 月 14 日，英国军界最高官员、陆军元帅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勋爵访问北京。莫理循在一封致陆军少将卜禄士的信中说："我希望中国人会以适当的礼仪来迎接他。据我所知，在访问过北京的英国人中，他的官阶最高。"后来的情况表明，莫理循的希望恰好是我们这个老大帝国最薄弱的环节。基钦纳在摄政王之弟载涛和陆军部尚书铁良接见之后，心中大为不满。据莫理循的记录：

> 房间是用石灰水刷的……连印度马夫都不住这样的房间。这难道就是制造出最精美瓷器的国家！一个打扮的邋邋遢遢的侍者给他端上一杯茶，杯上标着"不要忘记我，比利！"他断定另一只杯子上肯定印着"玛嘉特敬赠"。在外务部他们还转错了方向，竟跑到厕所里去。

接着是摄政王本人亲自接见，那可是帝国最高领导人的重大外交礼仪。但是，这次的效果更差：

> 基钦纳说："这些人必须下台。"印度没有一个土王（即使最小的土王也是如此）会在这样污秽、有失尊严的环境中接见他……他们一行走进一扇门时，从另一扇门悄悄地走进一个中国人，从他的装束来看好像是一个仆人。基钦纳继续向前走……突然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到了觐见室，那人原来是摄政王。他显得很紧张，形象一点也不尊贵，问的尽是一些最愚蠢、最陈腐的问题……简直难以想象这就是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基钦纳恶狠狠地说：必须把这样的统治者赶下台。

这样的外交真可谓越交越恶。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堂堂帝国，煌煌中华，何以寒酸如此？



卫理贤翻译的《论语》第二版扉页。在波恩一家旧书店买得。



波恩市的一个图书交换柜